

199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伯特·芒德尔学术贡献评述

李仁贵

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 (Robert A. Mundell) 由于其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对最优货币区的分析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 199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芒德尔 1932 年生于加拿大。早年曾求学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 后来曾到伦敦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生阶段学习, 并于 1956 年凭借一篇论述国际资本流动的论文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1-1963 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工作, 1967-1971 年曾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 年起担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芒德尔曾多次访问中国, 并于 1995 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

芒德尔大部分研究成果均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 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他于 1968 年所出版的《国际经济学》和 1971 年所出版的《货币理论》两本重要著作之中。鉴于芒德尔对经济学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 限于篇幅, 本文仅择与芒德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介, 对于其他方面的重要成就也顺便扼要提及。

一、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与稳定化政策的短期效应

芒德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拓展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框架。尤其是他在 1963 年所发表的《固定和浮动汇率条件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化政策》的开拓性论文中, 通过引入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要素, 扩展了由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首创的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的 IS-LM 模型, 从而系统地阐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芒德尔的模型突出了资本流动对利率差别的反应和净出口对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即实际汇率的反应。他论证了稳定政策的效果直接取决于国际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所执行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 芒德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同事马库斯·弗莱明 (Marcus Fleming) 几乎与芒德尔同一时期 (1962 年) 也提出了关于开放经济的稳定政策的类似研究成果。据此, 当今的教科书将该模型称之为芒

德尔-弗莱明模型。不过, 据认为, 无论是在深度上, 还是在分析力度上, 芒德尔的贡献都较弗莱明要更胜一筹。

严格地说, 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所分析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但实际上, 芒德尔则是从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对比的角度来考察稳定化政策的短期效应的。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 该模型最初是建立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 国内外的金融资产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在人们对汇率预期既定的条件下, 金融资产市场上的套利活动将导致国内利率与世界利率相等。假如国内利率高于世界利率, 随之所出现的资本流入将使得二者相等; 同样, 如果国内利率低于世界利率, 将会导致国内资本的流出。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前提下, 汇率体制安排的不同将会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有较大的不同。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财政政策的作用较大, 货币政策的作用较小; 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货币政策将是强有力的, 财政政策则是无效的。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中央银行需要维持某一给定的汇率水平。为此, 中央银行必须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来满足公众对外汇的需求, 从而相应地导致外汇储备的变动。或者说, 在固定汇率条件下, 汇率是给定的外生变量, 外汇储备则变成了内生变量。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而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时, 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会自动适应国内货币需求的变化。这时, 诸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改变货币供给等货币政策措施则被证明是毫无效果的。除非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中性化干预措施, 否则不可能在给定利率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的稳定。相反, 采取增加公共支出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却会导致经济活动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变动, 而不会因此受制于以利率或汇率变动等方式出现的挤出效应。

比如, 在资本完全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下, 一国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和抑制经济过热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那么, 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将导致利率水平的提高, 从而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 使得该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盈余, 并使得该国货币出现升值的压力; 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 将通过提

供本币的方式来收购外汇,从而导致高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与利率的逐渐回落;直到利率回落到原有水平为止,这时经济又恢复到原始的均衡状态。可见,由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最后完全由随之所出现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所抵销,紧缩性货币政策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同理,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由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将会由随之所出现的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过程所完全抵销,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样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相反,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假如一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状况并提高就业水平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当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时,由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减少所引起的总需求的扩大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和产出的增加;较高利率水平引起资本流入,从而使得该国出现国际收支盈余并造成该国货币出现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然通过提供本币的方式收购外汇,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强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直到利率回落到其最初水平为止,货币供应量才会停止增加,并使得经济重新恢复均衡。同理,当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时,政府支出的减少或税收的增加既会通过总需求的缩小导致产出的下降,又会通过利率水平下降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来强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财政政策既会通过总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产出水平,又会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同方向变化来强化财政政策的效果,因而财政政策极具效力。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由市场决定,中央银行不再使用货币来干预外汇市场,只需把外汇储备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或者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成为了给定的外生变量,而汇率变成了一个内生变量。这时货币政策成了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因为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总需求变化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动和资本流动的变化导致汇率的变化,进而导致进出口和总需求的更大变化。但是当货币供应量不变时,财政政策对需求的作用将被净出口的反方向变化完全抵销,从而使得财政政策将变得无效。

比如,一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状况并提高就业水平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下降并引起资本的流出,并使得国际收支出现大量赤字并造成本国货币的贬值;货币的贬值将使得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从而导致出口的增加与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总需求的扩大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国内利率仍然低于世界利率,本币就会一直贬值,直到利率水平上升到世界利率水平为止,这时经济又恢复到原始的均衡状态。可见,由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既能提高国民收入又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理,由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既能降低国民收入也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相反,在完全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变得相对乏力。比如,一国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和抑制经济过热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那么政府支出的减少或税率的提高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下降并引起资本的流出,从而使得国际收支出现大量赤字并造成本国货币的贬值;货币的贬值将使得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从而导致出口的增加与进口的减少,并导致总需求的扩大和国民收入的提高;总需求的扩大又导致利率水平的提高,直到利率水平恢复到世界利率水平为止,这时经济又恢复到原始的均衡状态。可见,在浮动汇率体

制下,紧缩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的减少被随之所出现的总需求的增加所完全抵销,从而紧缩性财政政策起不到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同理,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的增加也会被随之所出现的总需求的减少所完全抵销,从而扩张性财政政策起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然,完全的资本流动假设是芒德尔为分析问题方便起见而作出的高度抽象概括,现实中资本流动是不完全的,它要受到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芒德尔在后来的文献中,通过放松资本完全流动性的假设对原始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其结论是:由于现实世界中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这两种政策效应的大小则取决于资本流动对利率差异的反应程度,或者说取决于资本流动性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则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相反,资本流动性越小,则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大,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小。另外,芒德尔还认为,在大国的开放经济模型中,世界利率不是既定的,而是由世界金融市场所决定;这时经济政策具有国际性溢出效应,其作用的方向取决于政策手段和汇率制度。

原始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毫无疑问有其局限性。例如,与当时所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一样,该模型就金融市场的预期问题作了过分简单的假设,而且假定短期价格刚性。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改进,价格调整 and 理性预期也都被考虑到分析中,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芒德尔的分析结论。

二、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与有效市场分配法则

与20世纪60年代初所流行的主流研究传统相反,芒德尔并没有将其研究局限于对稳定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上,而是将其稳定政策研究拓展到长期的货币动态分析(Monetary Dynamics)之中。国际收支失衡状态下的经济调整是芒德尔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战后一段时期,对国际收支失衡的研究往往强调相对价格对外贸的影响,而且将其研究主要建立在静态的实体经济模型基础之上。相反,芒德尔受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所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思想的启迪,认为国际收支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且国际收支的调整是一种长期的也是自动的过程。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存量-流量调节机制”的货币动态模型来描述怎样出现和消除长期化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这一研究方法强调外部平衡调节中货币政策的作用,因而被称之为“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为此,芒德尔成为了“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创始人之一。

在芒德尔看来,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完全是由于人们所希望持有的货币量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并且,国际收支不平衡也完全可以通过货币存量与流量变化的调节过程来消除。比如,如果汇率固定并且资本流动迟缓,那么当一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会引起利率水平的降低与国内总需求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商品进口的增加与贸易逆差的扩大,相应地导致本国货币的外流或外汇储备的减少;另一方面,当货币供给量超过货币需求量时,也会引起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的减少与贸易逆差的扩大,相应地导致国内货币的外流或外汇储备的减少。因此,由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会导致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不过,在芒德尔看来,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引起的国际收支的扩大将会

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终将消失, 国际收支最终会恢复到均衡状态。因为, 随着国内货币的流出或外汇储备减少, 国内货币总供应量逐渐减少, 利率水平出现反弹, 国内总需求水平将逐步降低, 进口量也将逐渐减少, 贸易逆差逐渐缩小; 与此同时, 随着国内货币供给量的逐渐减少, 国内物价水平逐渐回落, 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 从而导致出口量逐渐增加, 相应地导致国外货币的流入与外汇储备的增加。最后, 贸易逆差完全消失, 经济又恢复到稳定均衡状态。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基本贡献在于, 它认识到和强调了固定汇率条件下国际收支的决定过程的货币存量-流量调节的本质特征。然而,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汇率可以随每种货币供求的自由市场力量而波动, 自由市场的均衡汇率在出口量正好等于进口量的点上出现, 这就不需要国际货币的净流动。不过,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决定过程也存在着与固定汇率制度下类似的自调节机制, 即国际收支失衡的趋势不是引起汇率变化, 而是以同样的力量支配着经济逐步调整。因此, 一般认为, 芒德尔所创立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为后来所出现的汇率货币方法奠定了基础。

芒德尔货币动态分析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他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稳定政策理论所作的研究。当时流行的主流的稳定政策理论是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与詹姆斯·米德先后所系统提出来的。他们假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经济政策都是在同一时间制定的, 并由同一只手来协调。相反, 芒德尔特别强调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调整速度的差异性, 据此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实现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方面将具有不同的功效, 从而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最优经济政策配合的“有效市场分配法则”。

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 各国政府必须承担两大经济政策任务: 既要实现稳定汇率下国际收支平衡的外部平衡目标, 又要达到兼顾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内部平衡目标。当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都得以实现时, 经济即处于最佳稳定状态。然而, 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 政策制定者往往将面临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难以同时实现, 或者说难以运用一种经济政策手段来同时实现的政策困境。比如, 当宏观经济同时面临内部不平衡与外部不平衡局面时, 宏观经济不平衡将以下列四种组合形式出现: 或者严重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 或者严重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 或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 或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假如经济处于严重失业和国际收支赤字并存状态, 那么, 消除失业实行内部平衡目标要求扩大总需求, 但总需求的扩大意味着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扩大; 反之, 外部平衡目标的实现要求缩小总需求水平, 但总需求的缩小将意味着失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样, 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的状态下, 该国政府也会同样面临政策实施上的两难困境。只有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或者严重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状态时, 政府可以通过紧缩总需求或扩大总需求才能同时实现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目标。

政府面临两难政策困境的原因在于, 经济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 即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 而所采用的政策手段却只有一个, 即均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控制总需求水平。而经济政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是, 实现几种政策目标要求利用相互独立的几种政策工具。为此, 芒德尔在 1962 年所发表的题为《固定汇率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的

论文中提出的, 要同时解决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的矛盾, 就需要配合使用对产出和国际收支具有不同效应的两种政策工具来进行解决。并且, 在所配合使用的两种政策工具之中, 每一种政策工具应当用于其能产生最大有利影响的市场或经济环境, 从而使其中一种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超过另一种政策工具的消极作用。这就是芒德尔所提出的“最优政策配合理论”或“有效市场分配法则”的基本思想。

通过运用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 芒德尔考察了国家预算和利率怎样分别导向并长期接近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大目标。在芒德尔看来, 当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控制需求的重要手段对于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目标可以产生不同的效应, 效应的不同意味着政府事实上可以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种政策工具去同时实现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目标。他认为, 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言, 财政政策对内部平衡的效应大于对外部平衡的影响, 即政府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效应大于对进口变动的影响; 而货币政策对外部平衡的影响大于对内部平衡的效应, 即货币量变动所引起的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大于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据此, 芒德尔主张, 货币政策应该负责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外部平衡目标, 而财政政策应当负责控制总需求的内部平衡目标。因此, 当一国经济处于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状况时, 通过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 可以减少货币供给量并提高利率水平, 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对吸引资本流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的作用将大于因此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减少的效应; 与此同时, 为了抵消利率提高对国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配合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种政策对刺激国内总需求, 增加国民收入、消除失业的作用大于由于国民收入提高而引起的进口增加对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合, 既可以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又可以实现外部平衡目标。同理, 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状态时, 也可以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配合而实现内部与外部平衡。

当然, 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 当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同时解决国际收支赤字与失业并存的困境时, 一方面, 由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高利率将限制私人投资支出与就业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 虽然高利率所导致的资本流入对经常项目赤字的弥补可以实现即期的国际收支平衡, 但一国外债的不断增长将使得利息支付成为一国的沉重负担。据此, 应该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内部与外部平衡。比如, 当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难以完全同时实现时, 首先应该确定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如果同时存在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 但主要问题是失业, 那么就要把政策重点放在刺激国内经济上; 相反, 如果主要问题是国际收支赤字, 就应该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上。此外, 除了货币政策以外, 还可以用各种支出转换政策的配合来实现外部平衡目标, 因为这些政策对外在平衡的影响一般都大于对内在平衡的影响。比如, 当国内利率水平相当低或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短缺时, 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水平的办法来吸引资本流入的效果就不明显, 这时就可以采用汇率贬值或关税等政策来解决外部平衡问题。

芒德尔的有效市场分配法则强调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联系, 而不是分权本身的理论基础。但是通过解释分权的条件, 他率先提出了很久以后才被普遍接受的思想, 即中央银行应授

予独立的稳定价格的责任。并且,芒德尔通过结合对经济政策短期效应分析与长期货币动态分析的考察,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条件,即“不相容的三位一体”的经济学原理。其基本内容是:只要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就能实现外部平衡目标(如控制汇率),或者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如控制价格水平),但不能同时兼顾内部与外部目标。因此,一些开放其金融市场的国家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要么选择固定汇率来决定其国内货币政策,或者选择浮动汇率来使得中央银行独立行使其货币政策。

芒德尔在货币动态分析中作出的贡献被认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他不仅开创了一种存量和流量动态分析方法,而且也寻找了一种在调整经济追求长期稳定状况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分析途径,因而他的研究方法在凯恩斯短期分析和古典长期分析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沿着芒德尔的思路,许多研究者对其货币动态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进一步证实了芒德尔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

三、最适度货币区理论

60年代初,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还主导着整个世界,但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讨论起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度各自的优劣性问题。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所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缺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所提出的“最适度货币区”思想。

为了取得净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如何来划分货币区?甚至,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放弃其货币主权而采用同一种货币?为此,芒德尔通过对需求转移机制的分析阐述了其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在他看来,需求转移是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比如,当人们对一国商品的需求转移到另一国商品上以后,就会引起两国之间国际收支的失衡。如果两国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只能通过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化才能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相反,如果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固定,那么只有通过两国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才能实现均衡。那么,当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即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或组成单一的货币区;而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应该分别拥有各自的货币并且汇率可以自由浮动。为分析说明问题简便起见,芒德尔假定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国家,比如这两个国家分别为美国与加拿大。并且美国与加拿大实行专业化分工,比如,美国只生产汽车而加拿大只生产木材,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均消费汽车和木材这两种产品。那么,当对木材的需求转移到汽车以后,将会引起加拿大的失业与美国的通货膨胀。如果美元和加元之间可以自由浮动,那么通过加元的贬值或美元的升值即可以抑制需求由木材向汽车的转移,这样既可以恢复两国间国际收支的平衡,又可以避免加拿大的失业与美国的通货膨胀。当然,如果两国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那么通过劳动力由加拿大向美国的转移,即可以减少木材的生产并增加汽车的

生产,以适应两种不同商品的需求变化。或者说,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美元与加元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也可以使经济实现均衡。

再假定,美国和加拿大按经济类型都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均生产汽车,西部均生产木材。那么,当对汽车的需求转移到木材上以后,就会均引起东部的失业和西部的通货膨胀。这时,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用货币贬值和扩张性经济政策来缓和东部的失业都会加剧西部的通货膨胀;反之,以货币升值和紧缩性经济政策来抑制西部的通货膨胀又会恶化东部的失业。当东部与西部之间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那么通过劳动力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即可以解决上述两难困境。而芒德尔所提出的另一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是,美加两国各自放弃国家货币而采用区域货币,即以东部元和西部元分别代替美元和加元,而且它们之间依然实行浮动汇率。这样,当需求发生转移时,西部元对东部元升值或东部元相对于西部元贬值,即可以阻止需求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这样既恢复了国际收支平衡,又在两个区域同时达到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芒德尔强调应该按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来划分最适度货币区,或者说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都应该组成最适度货币区。因而,在最适度货币区内,要素流动是货币区内的平衡机制,据此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或采用共同的货币;而在不同最适度货币区之间,要素不具有流动性,这时浮动汇率成为货币区之间的平衡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芒德尔特别强调最适度货币区中劳动力流动性的重要意义。因为他认识到,当需求发生转移或其它“非对称冲击”发生时,通过在特定区域降低实际工资来保持充分就业是很困难的,而只有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前提下才可以克服上述缺陷。据此,芒德尔将最优货币区域界定为这样的一些地区:当其中某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劳动力的高度流动倾向足以确保充分就业。

由于最适度货币区内汇率固定,区内各国市场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来说无异于一个统一市场。因而在最适度货币区内的国家之间消除了汇率波动对相互贸易和投资产生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促进区内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区内贸易和区内投资,进而刺激区内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当然,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货币区内成员国不能随意实行独立的、旨在实行本国稳定与增长的政策;并且由于成员国之间必须经常就经济政策实施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磋商,这也将增加经济决策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受利润率与工资水平的引导,区内的资本与劳动力总是流向收入较高的地区,从而将引起某些成员国潜在的经济损失。还有,如果货币区内使用共同的货币,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这意味着各国必须放弃相当大部分的中央银行权力。尽管如此,在芒德尔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提出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还对其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如麦金农(R. I. McKinnon)于1963年提出了用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构建最适度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凯伦(P. B. Kenen)于1969年提出了根据一国产品是否多样化而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另外,哈伯勒(G. Haberler)与弗莱明等学者还提出把政策一体化作为组成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四、供应学派经济学及其他贡献

在有关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论著中,当论及到供应学派

时都不得不提到芒德尔的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公告却只字未提及芒德尔有关供应学派的思想，或许这可能与供应学派理论本身存在争议有关。事实上，芒德尔曾被誉“供应学派的先驱”。因为他早在1971年就曾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增税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并且认为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此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不过较之其他极端的供应学派成员，芒德尔的思想中仍有倾向于凯恩斯的因素，因而并没有成为供应学派最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公告却提到了芒德尔其他两方面的贡献。其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他证明了，即使对外贸易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劳动与资本的国际流动性也将使各国商品的价格趋于相等。这一结论正好与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结论相对应，后者认为即使国际资本的流动和转移受到限制，商品的自由贸易也将导致各国要素报酬的均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能够完全取代商品的自由贸易。其二，对通货膨胀理论的贡献。他证明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会诱发投资者减少其现金余额而增加其实物资本构成，因而即使是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也会给经济造成现实的影响。由于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因而，通货膨胀的这一效应被称之为“芒德尔-托宾效应”。

五、现实意义与政策影响

芒德的理论最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含义。尤其是，芒德尔有关国际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成就，既可以很好地被用来分析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规律，又可以被用来制定国际经济政策决策。

首先，芒德尔能准确地把握住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脉搏，其有关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成就富有高度的远见性和超前性。比如，尽管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并且资本在国际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然而实际上，自40年代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定起，直至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止，几乎所有国家均被纳入到全球的固定汇率体系之中，并且这一期间资本也因受到广泛的资本与外汇管制而导致在国际间的流动性极小。然而，芒德尔早在5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即超前地考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在6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更进一步地对浮动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效应的政策后果作出了超前的思考。这说明，芒德尔早就意识到资本自由流动的不可避免性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随着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世界经济开始了一个储备货币多元化与浮动汇率普遍化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也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最突出特征。从而，芒德尔当时所创立的国际经济理论在随后所出现的世界经济运动变化过程中日益显露出其分析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活力。

其次，芒德尔的国际经济理论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对于分析当代国际经济的运动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比如，近年来多次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即可以在芒德尔的国际经济理论中找到答案。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先后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如1992-1993年发生了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发生了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还发生了巴西金融危机。实际上，每次

国际金融危机都能够从芒德尔所提出的“不相容的三位一体”原理，即资本自由流动、外部平衡目标与内部平衡目标不可兼顾的理论中找到依据。比如，从亚洲金融危机来看，东南亚国家货币多与美元挂钩，1995年后美元坚挺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升值，使得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严重削弱，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东南亚国家货币出现贬值的压力。而从80年代末开始，东南亚各国又大力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以便弥补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与经常项目逆差，结果这些国家就在经济上陷入了两难困境：若要保持汇率的稳定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会增加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加剧本币贬值的压力；若要维持资本自由流动和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能力，将无法保持汇率的稳定，从而会导致资本的大量外逃。加上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操纵，使得矛盾一触即发，结果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

最后，芒德尔的国际经济理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它已经被政策决策者应用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之中。比如，“最优货币区”理论即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在整个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欧共体或欧盟官方始终强调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充分流动的重要性，因而特别强调经济一体化应该与货币一体化建设保持同步。最早于1961年制定的《维纳报告》曾拟订分三阶段建成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以便最终实现欧洲的统一货币与联合的中央银行，其前提是共同体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在1985年12月欧共体卢森堡首脑会议上所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又规定在1992年底以前尽快建成欧共体内部大市场，以便实现商品、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1999年1月正式启动的欧元实际上是建立在欧盟国家生产要素已经达到了充分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他学者对芒德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也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发生了影响。也正因为如此，芒德尔因而而被西方学术界与政界誉为“欧元之父”。

参考文献

1. 瑞典皇家科学院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及背景材料，<http://www.nobel.se>
2. 陈彪如：《国际金融概论》（增补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 罗伯特·帕里：《在全球经济环境下实施货币政策》，载《国外财经》，1999（2）。
4. Mundell, R. A. (1960), The Monetary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4: 227~ 257.
5. Mundell, R. A. (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57~ 665.
6. Mundell, R. A. (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 MF Staff Papers 9: 70 ~ 79.
7. Mundell, R.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9: 475~ 485.
8. Mundell, R. A. (1968),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国安）